康雍乾三皇帝"藏富于民"经济思想探析

钱宗范

"Storing wealth among the people"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all absorbed this thought and further developed it in the course of their administrations. The idea of "storing wealth among the people"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peasants, workers, businessmen, and soldiers should get rich, but opposed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and despising business; 2)the rich and poor should get rich, but opposed relieving the poor through depriving the rich of the wealth; 3)they maintained that th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get rich abiding by the law, and opposed corruption.

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统一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出现了历史上闻名的"康乾之治"。康乾时期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主席曾论述过康熙对中国历史有四个方面的伟大贡献,即统一了中国领土,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统一战线政策,"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勤奋好学的精神,"是最早的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①]康熙在这四方面的伟大贡献,侧重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奖励廉政、重视科学、重视人才、中西交流等方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外,康雍乾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学习和总结了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统治经验,结合清代的历史实际,提出和力行"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分不开的。学者们对此问题很少有人撰文研究,笔者试作初步探析。

一

"藏富于民"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中的极珍贵的组成部分,它渊源于先秦时期,而以儒家学派提倡最力。

在先秦诸思想派别中,以儒墨道法四大派为最主要代表。其中先秦法家之重农,完全是为了支持战争和建立严刑酷法的专制主义政权提供经济来源。在法家思想中,重农并不包含着富农,重农和富农是对立的。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首先提出了富民的思想。当孔子周游列国时,见到卫国人口增多了,孔子对跟从他的弟子冉有说"庶矣哉!"冉有说"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2]孔子是把老百姓的"富"作为治政的要务来考虑的。孔子很多学生中有一个最像孔子的学生叫有若,鲁哀公因为财用不足想加重剥削,便去问有若,有若反对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这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富民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康雍乾"藏富于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初萌芽。后来孟子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政治理论,也是建立在安农、富民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人民能有田可耕,能衣帛食肉不饥不寒,这是"王天下"的根本。这是儒家重农、富民思想的主要表现。

到了战国末期,封建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新兴的封建国家已经基本巩固。作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表的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封建国家的理论。在经济思想上,荀子系统地提出了以"富民"来达到"富国"的理论。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而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这一套以富民、裕民来达到富国、富君的理论,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秦汉之际的历史证明,以法家的严刑苛政来治民,虽然重农而不能富农,虽然抑商而社会不安,不能达到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目的。汉兴以后,封建统治者总结了秦代速亡的历史教训,摒弃了法家思想,而采用经过改造的包含一部分法家思想的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汉代以来的儒家思想,表面上冠以孔孟之道,而实际上却是以荀子思想为主体,即学术界称之为"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的思想。其中由孔孟始创、由荀子大力发挥了的裕民富民达到富国富君的理论,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代比较杰出的君主都非常重视富民理论。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可以说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的。但是,西汉文景时期儒学思想还未占统治地位,一代明君唐太宗政绩显著,但贞观时期太短。我国历史上真正认真总结吸收并贯彻实践古代的富民思想,在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而取得巨大成效的,应该是被毛主席称之为对中国历史有四个伟大贡献的康熙以及其继承者雍正和乾隆。

二

康熙博学多才,文韬武略远见卓识,学贯中西。康熙的才华归结于他学习的刻苦。除了众所周知的他向传教士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在实践中努力推广外,他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的提出,则是他努力学习汉学,尊儒重道,认真总结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的结果。

康熙认为,官员要少干扰人民,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生活得到富裕,在此基础上才能求得国家的富裕强盛。这是康熙重要的经济思想。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月,十九岁的青年君主康熙在学习经学和历史之后,对讲官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大臣熊赐履听到此言后说:"皇上此谕,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5]他力创要"藏富于民":"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自古耕九余三,重农贵粟。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5]康熙主张农富,但并不反对工商富。他并不因重农而就去抑商,而是主张农和工商互相促进、共同富裕。在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康熙下令

开放海禁，要求官员少干扰民间的经营活动："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7]康熙还认为士兵的生活应该改善，武将克扣士兵粮饷是违背了养兵之道。康熙三十六年(1697)他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途中，看到陕北边区土地荒瘠，民生贫苦，使召集川陕总督吴赫等谕："朕往者未尝临边，不获目睹边地之苦。今巡行至此，视沿边地方土瘠民贫，但兵丁甚精锐，黄河以西榆林一带比他处实胜。然兵虽良，如不善抚绥而困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善抚绥者，但将其应得钱粮如数发给，即是养兵之道；若不知抚恤，虽多给国帑，兵丁断不能沾实惠。尔等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官顿忘在昔为兵之苦，而扣克粮饷，于心何忍？今虽末员，当计日后渐臻大任，可不存心爱惜兵丁乎？"[8]兵来自民，兵丁要作战勇敢，就必须让他们生活得过去，这不仅是打仗取胜的基本条件，也是不出乱子、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康熙强调"藏富于民"，主张富农、富工商、富兵。农为立国之本，富民主要是富农；但也要富工商，因为工商和农不可分，工商富了也会促进农富；也要兵富，兵富才能打胜仗，国家安宁。

雍正是一位厉行改革的雄主。他继续宣扬和贯彻了"藏富于民"的思想。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处理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赋税收入的关系，是国家富裕安宁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藏富于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经验。他说："国家经费既敷，则藏富于民，俾各家给而人足，乃朕之愿也。"[9]"朕但愿百姓之足时存益下之怀用，是特沛恩膏，著为定例，俾黎民轻其赋税，官吏易于催科，可饬令该地方官知之。"[10]雍正在位只十三年，但是他继承和发展了康熙的经济政策，在全国大力推行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蠲免赋税、赈济灾荒、耗羡归公、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重赏老农等政策，都贯彻了"藏富于民"的思想，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乾隆是康、雍"藏富于民"思想的进一步宣传者和实行者。他认为封建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国库要富裕，财力要充足，如果把劳动人民逼得民穷财尽，走投无路，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迫使农民起义，而且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影响到封建国家今后的财政收入，所以他一再对臣下大讲"藏富于民"的重要性。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对大学士阿桂说："朕以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且在官多一分，即民少一分，显而易见。朕即位初年，户部库银计不过三千万两，今四十余年以来……年谷顺成，财赋充足，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三次，蠲免天下漕粮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加增……现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11]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又说："泉货本流通之物，与其聚财于上，毋宁藏富于民。"[12]乾隆在他长期的治政经验中体会到，"藏富于民"，让人民得到一个发展生产和生活下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封建国家增加财源收入的根本所在；反之，把老百姓榨得一干二净，虽然表面上看来收入暂时增加了一些，但人民愈益贫困以至濒临死亡的边缘，就必然严重破坏生产，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就没有依靠，国家也就会越益贫困。康雍乾时期实行的从废除圈地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经济改革，封建国家赈济蠲免的次数之多、数目之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仅见的；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国家的太平富裕，蠲免的次数和数额更超过了康雍时期。这正是在封建最高统治者"藏富于民"的思想指引下实行的；而康雍乾时期，尤其到了乾隆统治的清代中期，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到极盛，封建国家非常富裕，封建国库的收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历史事实证明："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是正确的，在当时是起了重大进步作用的。

三

康雍乾三皇帝提倡和力行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对清代的富裕强盛、社会和民生起了进步意义；而且在理论上对孔孟以来的富民思想有重大的创新的发展。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主张农、工、商、兵均富，既重农又重工商。中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法家是重农抑商的最积极鼓吹者。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虽然都重农，但抑商、轻商的思想和习惯一直沿续下来，这在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思想家的著述以及国家的政令中多有反映，从荀子主张的"省商贾之数"到汉武帝严重打击奴隶主工商业者，是其中较突出的。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中，康熙首先把农富和工商富、兵富并提，继承了重农的思想，取消了抑商的传统，是非常杰出的见解。众所周知，农、工、商，都是封建国家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就已经非常明确，孟子就曾驳斥农家代表许行那种什么用品都要靠自己生产的错误观点。农业是基础，农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先进的工具和其他用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农、工、商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应该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才有利于社会经济不断前进。传统观点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兼并农业，高利贷者是促使农业破产的蛀虫等，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工商业的发展有时会侵蚀小农经济，但更主要的方面是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整体农业经济的水平便不可能提高。如果说，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国家抑商有打击奴隶主经济残余的目的，那末到封建后期，实行农工商协调一致的发展，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康熙的"藏富于民"，包含了农富、工富、商富、兵富在内，无疑是对富民思想的重大发展，对促进清代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滋长是有利的。

第二，主张富民与穷民都富，反对剥夺富民以迁就穷民。康熙在论述"藏富于民"思想时，不仅主张富农、富工、富商、富兵，而且非常明确地把"民"与"官"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民"即指古代不当官的农、工、商、士等一切社会阶层，也包括不当官而经营土地属于"农"之内的地主，"民"并非全指劳动人民。所谓"藏富于民"，也是和"藏富于仓库"、"藏富于君"、"藏富于官"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说康熙等"藏富于民"、"爱民如子"等话，绝不意味着封建皇帝爱劳动人民，而只是反映了比较杰出的君主的一种开明政策，因为所谓的"民"中本身就包含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只不过因他们都不当官而属于"民"。所以，"富民"即富除了皇室、官员以外一切社会阶层的人。他们就是古代的"百姓"，都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康雍乾三皇帝在实行"藏富于民"的各项政策时，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均是得利的。康熙不仅把富商、地主等不属于官员的都列于"民"内，而且反对剥夺地主而去富农民。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康熙谕大学士说："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资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⑬康熙说的这段话是他推行"藏富于民"政策的阶级性的最好写照。"民"包括了经营土地、工商的"富民"，康熙坚决反对剥夺"富民"来迁就"穷民"，因为"富民"虽不是官，毕竟是封建皇帝的阶级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清代史书上大肆宣扬"藏富于民"、"爱民如子"一类话的阶级性就看得很清楚了，皇帝之爱民、富民只是其一项富有远见的政策。

康熙主张富民要既富穷民，也富富民，反对剥夺富民财产来使穷民致富，这固然反映了封

建皇帝政策的阶级性，但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正确措施。康熙要求富民、穷民都能致富，各守本分，遵守封建法制，维持社会稳定，才是国家富裕鼎盛的前提。富民违反法制过度榨取穷民，官员不依法律随意剥夺富民来迁就穷民，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点和规律，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动荡，不可能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康熙反对这样做是合理的。

第三，主张民与官在遵守封建法制下的均富，为官员勤廉创造条件。为了要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康雍乾三皇帝提倡官员要勤政务实，廉洁奉公。除了在官场中打击贪劣、表彰模范官员等办法外，也推行让官员在遵守法制的前提下能富的政策，这突出反映在雍正推行耗羡归公和设养廉银的制度上。清代官俸偏低，正一品官年俸银不过三百余两，禄米百余石，地方知县等七品小官年俸银不过数十两，禄米二十余石。封建社会中真正克己廉洁的官员是少数，多数官员生活追求豪华富贵、官场中送往迎来的开支甚大，官员如此低的俸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清前期军费浩大，国库空虚，中央政府还常令官员捐出俸金供公用，实际上等于怂恿和鼓励地方官向人民横征苛索，地方官也很乐意将俸金捐出以邀好名，另外更加倍地向民间搜括财富以弥补自己的收入。这样做不仅使封建国家财政制度混乱，而且会影响富民、安民的根本政策，还会导致贪赃之风的滋长，最终造成社会动乱。雍正主张不仅要"藏富于民"，而且官也要能富。他认为要使"官员丰足，督抚司道亦皆饶余"，否则俸给过低，"令天下人视官场为畏途。"[14]于是他一面严厉打击贪污，禁革官吏私派苛征的种种陋规；一面又把过去由地方官员私派私分的耗羡银改为政府规定的正式附加税，由省一级的督抚藩司派征支配，将其中一大部分以"养廉银"的名义分发给地方官员作为官俸的补充。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数目很高，有的甚至超出正常俸金的数十倍，一般督抚每年一万五千两，道员每年三千至四千两，直隶州的知州每年一千八百两，府属知州每年一千四百两，中县知县每年一千二百两，小县知县每年一千两。官员有了国家规定的富足生活的基本条件，在雍正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和严惩贪官的时候，他们贪暴百姓的作为也有所收敛和遏制，这是保证他们执行皇帝旨意，推行"藏富于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雍正既实行"藏富于民"，又制订政策让官吏通过合法途径也能富裕，杜绝了地方官吏苛政暴民的一个重要根源，取了重要效果。清代学者魏源说："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而（乾隆）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而归政．其数如前，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或曰：然则康熙六十载之休养，何以部帑止存八百余万，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羡未归公一也；常例未捐输二也；盐课未足额三也；关税未盈余四也。"[15]魏源所总结的四点封建国家致富的原因，都与民富以后税收的增加，官富以后对耗羡银侵夺的减少有关。民富是基础，官富是重要条件；在民富基础上才有官富，官富后又进一步推动民富，以达到封建国家之富，这是雍正既"藏富于民"又让官员富裕的根本目标。虽然封建社会中不可能避免官员贪劣侵暴人民的现象，但应该说康雍乾时期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是达到民富、官富、国家富的基本目标的。长达 130 余年的康乾盛世的出现以及魏源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首先提出人口过多是民富的压力，并提出和实行了相应的措施。乾隆皇帝进一步把"藏富于民"的政策与控制人口增长、减少浮食之民，增加劳动人数联系起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清代人口出现急剧增长之势。乾隆间，我国人口从不足一亿激增至三亿以上。学者洪亮吉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设想。远见卓识的乾隆帝在实际治政中也深感人口增加过快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压力，进一步提出了节制人口增长，实行增产节约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主张。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

月，他给内阁的谕令中说："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作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15]乾隆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影响民生富裕而忧虑，于是他推行了一些办法企图来解决这一矛盾：

1. 奖励垦荒，提倡努力耕作，实行增产节约。他再三要求地方官："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侈，习于怠惰。"[17]

2. 禁止道士、僧尼等不事生产的浮食之民增加，禁止民间丧葬饮宴奢侈之风的发展。他多次下令禁止丧葬侈靡过费；下令僧尼还俗，由浮食之民变为生产之民。他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天下多一僧道，即少一力作之农民。若辈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且甘食美衣，公然以为分所应得，不知愧耻。是以上农夫二三人肉袒深耕之所入，而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之用，既耗民财，复溺民俗。"他训令军机大臣说："尔等可密寄信与各督抚，令其徐徐留心，使之（僧、道）日渐减少。"[18]由于时代和阶级条件 限制，乾隆不可能推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加、保证人民富裕，他本人晚年生活也趋于奢侈浪费，但他毕竟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敏锐地觉察出人口激增对社会发展和民生富裕带来的巨大压力，并采取了奖励垦荒、提倡俭朴节约，增加生产人员，控制和减少不事生产的浮食之民等积极的办法，来试图长久保持民富国富的局面，以解决这一矛盾。可以说乾隆皇帝在理论上对此是有贡献的，并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综上所述，康雍乾三皇帝"藏富于民"的思想和政策虽然有它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其目的是为了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但它在清代毕竟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从经济思想上讲，三皇帝"藏富于民"的思想，在总结我国古代儒家富民学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作了深化和发展，阐述了财和源的辩证关系，源丰才能财足，源枯必然财乏；而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民"，事业兴旺，经营发达，生产丰收，生活富裕正是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源。与民相对的"官"，也能在遵守封建法制前提下享受富足生活，做到"民富"与"官富"的相互促进，并且减浮食之民，增加生产，勤俭节约。这样"藏富于民"才能够起到促进国家富足强盛的目标。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历时最长、对今天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封建盛世。这一盛世的出现，是和三皇帝或多或少地实行了"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有关。相反，历史上社会动乱、国穷财尽的时期，也都是把老百姓榨取得生活不下去的时期。可见，这一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败盛衰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

①参阅上海《报刊文摘》1994 年 4 月 4 日第 2 版《毛主席谈康熙》：原载 1994 年 3 月 26 日《文艺报》。
②《论语·子路》。
③《论语·颜渊》。
④《孟子·梁惠王上》。
⑤⑥⑦⑧⑬《清圣祖实录》卷 40；卷 81；卷 116；卷 182；卷 266。
⑨⑩⑭《清世宗实录》卷 98；卷 30；卷 22。
⑪《清高宗实录》卷 1141。
⑫⑯⑰《清高宗圣训》卷 5；卷 85。
⑮《圣武记》附录卷 11，<武事余记·兵制兵饷>。
⑱《东华续录·乾隆九年》。